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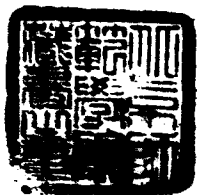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马齐彬 黄少群 刘文军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马齐彬
黄少群
刘文军

人
民
出
版
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93063

1093063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

ZHONGYANG GEMING GENJUDI SHI

马齐彬 黄少群 刘文军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5印张 418,000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850

书号 11001·885 定价 3.05元

前 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彻底认识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军队和革命人民，经历了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终于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夺取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条胜利的道路，就是毛泽东为代表所开创的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因此，解剖农村革命根据地特别是中央革命根据地，阐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就成为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课题。我们抱着学习的态度，对中央革命根据地作了一翻解剖，目的是想借此来提高我们的党史研究的水平。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丧失，使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在这块根据地内，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展开了全面的、激烈的斗争。我们想通过对这块根据地的解剖，能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反映出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同时说明毛泽东和朱德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①。

剖析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遇到了很多难处。如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斗争过程还不太清楚，一些重要历史问题还没有正式的结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论，还有一些问题在党史界存在着不同看法，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只能就目前的状况和自己的认识水平来加以阐述，或略而不述。而论证上的不够准确，分析上的不够全面以及认识上的差错，都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愿意就这些问题向大家请教。

本书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大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在叙述每一个阶段的历史过程中，着重地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是：

第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阶段，这大体上包括本书的第一至四章。我们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应该以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为起点。本书的第一章写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和井冈山的斗争，是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背景来叙述的。到一九三〇年六月，作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基本地域范围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和红一军团的成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这个阶段，着重分析和论证了为什么能在赣南、闽西地区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古田会议决议——党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的产生，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及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党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等问题。

第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阶段，这大体上包括本书的第五和第六章，时间的跨度是一九三〇年八月到一九三一年底。这个阶段从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以及全苏“一大”的召开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特别是通过第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到有五万平方公里面积、二百五十万人口和占有二十一座县城（赣南十一座、闽西十座）的相当大的规模。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在这个阶段中，着重分析和论证了毛泽东、朱

德由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怀疑到抵制，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原因，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形成及其内容，并对全苏“一大”的召开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的抵制和斗争阶段，这大体上包括本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时间的跨度是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九月。在这个阶段中，着重叙述和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各革命根据地、主要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推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几次重大斗争，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党代会，一九三二年十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的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等。同时在这个阶段中，还叙述了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王稼祥等在战争问题上对毛泽东的支持以及在他们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原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查田运动等问题，也作了大致的叙述并表示了我们的看法。

第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阶段和遵义会议的召开，这大体上包括本书的第九章和第十章，时间的跨度是从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这个阶段中，对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原因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和分析，并叙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的抵制和斗争。同时叙述了长征途中的转兵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分析了遵义会议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只能主要从军事问题上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从而使遵义会议成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以上是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认识，也是对本书内容的基本概括。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和受到一些历史资料的限制，书中难免有错漏之处，诚恳地欢迎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使本书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能得到纠正。

作 者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党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斗争	1
(一) 大革命失败，在农民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	1
(二) 八七会议和各地武装起义	11
(三) 井冈山和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初创	22
(四) 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	27
(五) 反对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进剿”和“会剿”	34
(六) 柏露会议的重大决策	41
第二章 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47
(一) 一九二九年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	47
(二) 铁流滚滚下赣南	55
(三) 风云突变进闽西	66
(四) 建立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	75
(五) 中共闽西党的“一大”	83
(六) 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形成	89
第三章 红四军党的古田会议	102
(一) 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	102
(二) 红四军党的“七大”	109
(三)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123
(四) 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的召开	130
(五) 古田会议决议的内容及其贯彻	136
(六) 古田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	144

第四章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51
(一)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151
(二) 回师赣南，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	160
(三) “二七会议”促进了赣西南革命形势的发展	163
(四) 分兵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赣南革命根据地	170
(五)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和《寻乌调查》	182
(六)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192
(七) 党的土地革命政策	201
第五章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及其被克服	207
(一)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 新发展	207
(二)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形成	211
(三) 汀州会议，红一军团向南昌进军	216
(四) 红一方面军成立和二打长沙	221
(五) 袁州会议和攻打吉安	234
(六) 从峡江会议到罗坊会议	240
(七)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被克服	249
第六章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革命 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252
(一) 第一次反“围剿”战争	252
(二) 中共苏区中央局的设立	275
(三)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	280
(四) 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296
(五) 人民战争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	303
(六) 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315
(七) 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巩固和壮大	326
第七章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的推行	333
(一)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生及其实质	333

(二) 赣南根据地党的代表大会·····	342
(三) 打赣州和打漳州·····	346
(四) 宁都会议·····	355
(五)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368
第八章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与王明“左”倾错误的斗争·····	391
(一) 所谓反“罗明路线”·····	391
(二) 所谓反“邓、毛、谢、古”·····	402
(三) 查田运动的开展·····	411
(四)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430
(五)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443
第九章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451
(一) 一九三三年的国内形势，国民党对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和部署·····	451
(二) 所谓“分离作战”的方针和东方军的入闽作战·····	462
(三) “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主义作战方针·····	470
(四) 处理“福建事变”中的“左”倾错误·····	479
(五) 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	493
(六) 广昌失守，消极防御·····	500
(七)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开始·····	504
第十章 中央红军长征和党的遵义会议·····	514
(一) 红军突围的准备·····	514
(二) 突破四道封锁线，红军折损过半·····	519
(三) 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红军转兵入贵州·····	527
(四) 遵义会议——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534
后 记·····	549

第一章

党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而斗争

(一) 大革命失败，在农民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推动和影响下国共合作共同进行的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在这场革命的初期和中期，党的方针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党不仅领导推动建立了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而且还领导发动了千百万工农群众特别是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的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削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但是，到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阻挠和破坏农民运动，反对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结果，农民的革命势力受到摧残，工农联盟受到损害，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受到削弱，这就加速了国民党右派的叛变和统一战线的破裂，并最终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在农民问题上有以下几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提出来进行研究和总结的。

第一，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党认识到了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对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党建立初期，将工作重点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离开了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就失去了本源了。但是自“二七”惨案以后，党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一部分有识之士，逐渐开始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但那时下决心到广大农民中去做艰苦工作的同志不多。最早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彭湃就在广东的海丰及其附近陆丰、惠阳地区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进行“反对地主升租吊田”的减租斗争。后遭到军阀陈炯明的镇压而一度低落。一九二四年七月，我党以国民党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主持了第一届农讲所的工作。这是我们党重视农民运动的一个重大措施。

毛泽东是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后开始投身农民运动的。由于五卅运动的影响，农民运动在一九二五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湖南农民更“变得非常有战斗性”^①。一九二五年春，毛泽东曾因病回湖南韶山家乡休养。五卅运动后，他看到了农民的力量。于是他离开了“在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②。他深入到农民中去调查农村的政治经济状况，创办农民夜校，在农民中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道理。他亲自建立了韶山党支部，几个月之内在韶山、银田寺一带先后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的农民协会。

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政府的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和一次南征，各地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给了革命军以积极的支援，他们为革命军作向导、侦察敌情、担任运输、供给粮食。每当革命军占领一个城镇，广大工农群众都热烈欢迎和热情慰劳。农民的积极支援和协助，是广东革命军东征和南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这使党内更多的同志进一步看到了农民的力量。

①②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44页。

一九二六年五月至九月，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广泛搜集有关农民运动的资料，编辑出版《农民问题丛刊》，九月他为这个丛刊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并把这种经验提到有关整个中国革命成败的高度去认识，对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作了深刻的论证。毛泽东明确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①“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②他还指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③

在这篇序言中，毛泽东还针对当时做农民运动工作的同志不多的情况，大声疾呼：“我们的同志于组织工人、组织学生、组织中小商人许多工作以外，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了决心，去做那组织农民的浩大工作。要立刻下了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要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夏天晒着酷热的太阳，冬天冒着严寒的风雪，搀着农民的手，问他们痛苦些什么，问他们要些什么。从他们的痛苦与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④毛泽东的这篇序言，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时广州农讲所第六届学员即将结业，三百多学员后来正是按照毛泽东所提出的指导思想，积极奔赴全国广大农村的，其中许多人都成了各地农民运动的组

^{①②③} 见《农民运动》第八期，1926年9月21日。

^④ 见《农民运动》第八期，1926年9月21日。

织者和领导者。

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的北伐战争，得到了全国革命农民的热烈拥护。尤其在作为北伐主战场的湖南、湖北、江西地区，北伐军更得到了革命农民的有力支援和配合，这是北伐军能迅速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主力、夺取北伐战争重大胜利的重要原因。也因此，使党内认识和重视农民运动重要作用的同志逐渐地多了起来。如彭湃、瞿秋白、李大钊等一些党的领导同志，当时都对农民运动发表了很好的认识，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一九二六年十月，为了推动全国的农民运动，彭湃撰写和出版了《海丰农民运动》一书。该书全面而生动地总结了海丰宣传、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陈延年和周恩来十分重视此书，他们曾分别对书稿作了修改并为它的出版题写了书名。同年十一月，瞿秋白发表《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一文，也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国民政府能够得到农民，则国民政府才能巩固，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胜利，真实拥护工农的党才能够领导中国革命。”^①他还提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的基本办法：“（一）解决农民经济的束缚，用政治势力切实解决之；（二）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使他（们）有自己的武装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三）农民参加政权，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的也要有农民代表，凡是行政要有农民与一般人士代表会决定后才能实行。”^②为了推动北方的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八月，李大钊在《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中，曾系统地分析了鲁豫陕农民自发的红枪会运动。他明确提出，从事“农民运动者”，“觉悟的青年”和“知识分子”，“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使他们知道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本质，“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

^{①②} 见《我们的生活》第四号，1926年11月30日。

动中的地位和责任”，明了“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免遭军阀、土豪的利诱和利用，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①

他们的这些著述和毛泽东的著述一起，代表了党对农民运动的新认识，同时对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农民问题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最根本的问题。

北伐战争的胜利，更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尤其在两湖及江西地区掀起了农村大革命的风暴。在农民革命运动的威力所到之处，几千年封建地主阶级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会则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这就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动摇了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前景。

面对着这种蓬勃兴起的农村革命形势，首先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分子，表现出了惧怕和仇恨。他们一方面伙同逃亡到城市和军队中的土豪劣绅大叫大嚷，胡说什么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大造反革命舆论；另一方面，则支使各地的反动派对农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纠集各种反动势力，惨杀农民协会干部，收缴农民枪械，强迫农民协会改组，禁止农民协会活动，捣毁支持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县党部。他们还唆使流氓冒充农民进行各种破坏活动，然后，嫁祸于农民协会。

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问题也成了两条路线分水岭。陈独秀

^① 《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69 页。

基于他的“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一向认为农民难以加入革命，反对党用大的力量去领导农民运动的开展。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他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农民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①而当北伐战争前后，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的时候，陈独秀、彭述之等右倾机会主义者也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他们害怕农民势力高涨会吓跑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因而破裂统一战线。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农民运动的发展。当蒋介石等关于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等反动言论甚嚣尘上的时候，陈独秀竟也跟着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并且公然地决定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目前还只能宣传，不能立刻实行。在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强制下，有些地方的党组织竟实行所谓“洗会运动”，把英勇地担当革命先锋的贫农骨干当做所谓“痞子”，从农民协会中清洗出去，甚至逮捕起来关进县监狱。这就大大损害了贫农的威信，助长了土豪劣绅的气势。

对于党内、党外这两股反对和摧残农民运动的潮流，毛泽东等优秀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抵抗和斗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省农民协会在党的领导下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并亲自参加大会议案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帮助大会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大会决议严正指出：打倒土豪劣绅是铲除封建制度的革命行动，“是由封建秩序到民主秩序之必然的过程”^②，所谓“农村纠纷”问题，即是农村中的革命运动。“这时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②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1926年12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0页。

风压倒东风”，对农民运动“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这不算是革命党”^①。大会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农民运动的谬论进行了严厉的驳斥。

为了进一步驳斥反革命派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污蔑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毛泽东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至二月五日，到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实地考察了农民运动，获得了大量准确地反映农村大革命的材料。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简要报告，尖锐地指出党在指导农民斗争中犯了右的错误，列举了纠正这些错误的要点。这个书面报告，还针对陈独秀等人在土地问题上的右倾方针，深刻地指出：农民问题实质上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土地问题。解决贫农的土地问题“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刻实行的问题了”。三月，毛泽东又公开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个报告，热烈歌颂农村大革命的丰功伟绩，驳斥了各种污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做农运工作的同志的欢迎。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从三月五日起陆续刊登了这个报告的全文。三月十二日，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也刊登了这个报告的一部分。而坚持右倾投降主义的陈独秀（总书记）、彭述之（宣传部长）顽固地表示反对，不准《向导》将这个报告登完。当时，中央局五人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的瞿秋白不同意陈、彭的做法，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于四月间在汉口出版了单行本，并亲自为书的出版写了序言^②。瞿秋白在序言中热烈赞扬湖南农村的农民大革命。他指出，湖南农民起来把

① 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乡村自治问题决议案》，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7页。

② 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见《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345—348页。